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七編

林慶彰主編

第8冊

皇侃《論語義疏》與
邢昺《論語正義》解經思想比較研究

王家苓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皇侃《論語義疏》與邢昺《論語正義》解經思想比較研究／
王家苓 著——初版——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2+158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七編；第 8 冊）

ISBN：978-986-322-375-7（精裝）

1. 論語 2. 研究考訂

030.8

102014629

ISBN-978-986-322-375-7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七編 第八冊

ISBN：978-986-322-375-7

皇侃《論語義疏》與邢昺《論語正義》解經思想比較研究

作 者 王家苓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十七編 34 冊（精裝）新台幣 6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皇侃《論語義疏》與
邢昺《論語正義》解經思想比較研究

王家苓 著

作者簡介

王家苓，台灣台北人，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從事中國經學史、思想史研究。已發表的單篇論文有〈錢穆先生的「宋學」精神〉、〈劉敞、歐陽修、王安石三家人性論與聖人觀析論——兼論其與程朱理學的幾點思想差異〉、〈從王弼「性其情」說到程頤「性其情」說〉、〈近三十年來對易占具有重要參證價值的考古文獻綜述〉、〈魏晉南北朝「神明」觀念的變遷〉等篇。本論文由何澤恆教授指導。

提 要

在中國「以述為作」的注疏傳統中，經部典籍不僅存在著經學方面的問題，同時也蘊含有哲學思想的問題。南朝梁代皇侃的《論語集解義疏》，與宋初邢昺領銜下所編纂的《論語注疏解經》（又稱為《論語正義》），是《論語》學史上兩部分別具有不同承先啟後重要意義的代表之作，同時也是由六朝「義疏」體過渡到唐宋「正義」體的重要經學史文獻。本論文之寫作，是希望透過比對這兩部《論語》注疏中的解經思想，梳理出從魏晉六朝到宋初之間，思想義理的發展脈絡。特別是邢昺《論語正義》既是本於皇《疏》刪改而成，在刪改與承繼的過程中，流露出一種怎麼樣的學術思潮轉變與發展樣貌，是本文所集中關切的主題。為了更有效的呈現此一思潮轉移的發展線索。本文所採取的方式，是先選擇幾個關鍵性主題為綱目，透過這幾個綱目主題的討論，逐步梳理出皇《疏》與邢《疏》在整體思想內涵上的轉變。

本文共分五個章節，在第一章「緒論」中，筆者初步交代皇《疏》與邢《疏》在經學史與思想史中所代表之雙重意義，並簡述本文之取材及研究方法。第二章「皇《疏》與邢《疏》解經思想中的人性觀比較」，透過對兩《疏》中「性」、「情」……等概念定義之解析，做為探討皇《疏》與邢《疏》思想觀點的起點。第三章「皇《疏》與邢《疏》解經思想中的『道』與『理』」，探討兩《疏》解經思想中「道」、「理」意涵的發展，及其所流露出之天人觀念轉移。第四章「皇《疏》與邢《疏》解經思想中的聖人之教」，接續前章脈絡，討論兩《疏》解經思想中聖人形象與聖人之教的意涵。第五章「結論」，總結全文，統整皇《疏》與邢《疏》在整體思想趨向與解經態度上之差異，嘗試探求其中所反映出之時代思潮發展態勢。



目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課題與動機	1
一、經典詮釋與思想史發展	1
二、《論語》的文本特質	2
三、皇侃《論語義疏》與邢昺《論語正義》	3
第二節 本文之取材與作法	5
一、前代研究成果回顧	5
二、本文研究取徑	7
三、凡例與版本	9
第二章 皇《疏》與邢《疏》解經思想中的人性觀比較	13
第一節 「性近習遠」與「上智下愚不移」章之疏解	15
第二節 論「性」與「情」——「性」之本體義與氣性義	21
第三節 解經思想中的氣性意涵	29
一、五常氣性	30
二、氣性之「偏」與「全」	34
第四節 性品有等	38
第五節 小結	46

第三章 皇《疏》與邢《疏》解經思想中的「道」與「理」	49
第一節 論「道」	51
一、「道不可體」與「通物之妙」	51
二、「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	59
三、「人生得在世，皆由先王道理而通」	65
第二節 論「理」	70
一、「理」概念的發展	70
二、「理」與「道」的連結	75
三、「統本」與「理極」	77
第三節 小結	83
第四章 皇《疏》與邢《疏》解經思想中的聖人之教	87
第一節 對《論語》與聖人意涵的新定位	87
一、《論語》的「圓通之教」	87
二、聖人「應機作教」	92
第二節 聖賢境界	97
一、「任道」與「照之以道」	97
二、「虛中」與「知道」	102
第三節 聖賢角色的扮演	106
一、賢聖道絕而相輔	106
二、聖人體道行化	112
第四節 小結	117
第五章 結 論	119
參考文獻	127
附錄：從王弼「性其情」說到程頤「性其情」說	13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課題與動機

一、經典詮釋與思想史發展

自從晉·荀勗《中經新簿》將中國圖書分類為四部之後，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大致為中國藏書編目者所遵循。進入近代，受到西方研究範疇分類的影響，出現專注於思想哲學領域研究的學術分科，然而也因為大部分所謂哲學類思想文獻，出自於傳統圖書分類中的子部，致使現今一般研究中國哲學的人，習慣上在處理過子部圖書後，便以為全面涵蓋了當期思想，而往往忽略了經學裡頭的哲學內涵。其實在經部典籍中，不僅存在著經學方面的問題，同時也蘊含有哲學思想的問題。在中國學術文化與思想史的漸次發展中，經部典籍的注疏傳統不曾中斷，同一部經書在不同時代透過不同的解經者，反覆經歷再詮解、再創造的過程，箇中的義理內涵也因之而呈現不同的思維樣貌。因此，研究中國經典傳統在各個時代的不同注解，同樣也能引導出哲學問題。

特別是中國自先秦以後，各時期的學術思想鮮少再以原創性的文本創作形式呈現，而是依存於對先秦典籍的重新詮釋，即所謂的注疏形式中，這種「以述為作」的義理抒發方式，是中國學術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殊傳統，在孔子時期便已經有了〔註1〕。注解者因著時代精神與思潮的吸收滲透與相互交

〔註1〕《論語·述而》中云：「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見《論

融，在解經過程中使得經典的詮釋內涵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透過歷代解經者的解經過程，經典得到與不同時代精神對話的機會，不同的時代思潮與存在氛圍，使得經典的義理內涵，呈現出了不同的姿態樣貌。然而，這種經學史的演變，不僅在哲學史裡不被注意，經學史中也往往是浮光掠影，一筆帶過。因此，若能循著此一思路去建構《論語》學流變的軌跡，必也能碰觸到一些相關性的哲學問題。這對中國思想與經學研究者來說，亦當為另一面相的發掘。

二、《論語》的文本特質

然而，在眾多經典中，筆者又為什麼選擇《論語》注疏來作為魏晉到唐宋間學術與思想轉變的考察對象呢？我想，從漢末魏晉時期開始逐漸湧現的《論語》注疏，與《論語》義理內涵漸受重視過程中所反映出的經典意識轉移，應是最主要的原因。

這和《論語》文本本身所具備的義理內涵與經典特質是相當有關係的。首先，《論語》文本言簡意賅的特性，使它為後代解經者預留了更開放寬廣的詮釋空間。其次，《論語》所載以孔子及弟子時人間的言論對談、生活行事的記載彙編為主，主要就著重在人事修為層面，但隨著時代思潮的不斷發展，對天道性理的關注早已成為一不可逆轉的趨勢。特別是進入魏晉，如何調和老莊自然之道與儒學名教倫理，成為此一時期思想家關注的焦點。因此，若想將儒門之教與老莊之道互相發明，就必須對《論語》下新解不可，所謂下新解，是必須使《論語》中的思想與時代思潮相契合。這使得《論語》在魏晉時代，成為《周易》之外，玄學家發揮思想的最好替代工具，大部分的玄學家在三玄的著述之外，也留下關於《論語》的注疏，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註2〕。故劉大杰先生在《魏晉思想史論》一書中云：「建安以後，儒學的權威是倒了，但是那些玄學家並沒有輕視孔子，對於經學也還沒有放棄。他們努力把老莊的學說，灌到經學內去，將儒道兩家的思想，加以溝通和調和。……他們要調和儒道，最重要的工作，是把道家的學說灌到經學裡去。《論語》和

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7年8月初版第十三刷，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本《十三經注疏》，頁60。以下所引《論語》原文皆依此本，不另作註。

〔註2〕相關整理見柯金木：《魏晉論語學考述》（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董金裕先生指導，1990年）。

《周易》是儒家哲學的兩大基礎，於是他們就從此下手。」〔註3〕這些關於《論語》的注疏，很可惜的，現今大部分都已亡佚，唯一留存下來的，是可謂集六朝《論語》注疏大成的皇侃《論語集解義疏》，透過這部作品，讓我們有機會窺視六朝《論語》注疏之一貌。

從魏晉六朝到唐宋這段期間，不僅是中國學術與思想發展轉向的關鍵期，亦是中國經典詮釋意識轉移的一個重要時期。由兩漢獨尊五經，歷經魏晉六朝新經學意識的洗禮，南北朝分峙的各自發展，進入唐代，又在官方領銜下重新統合南北經學以定於一尊。對經典意義的認定，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擴大，從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到後來逐步有所謂七經、九經，乃至十二經的逐步擴大，在這段期間裡，《論語》由附於「六藝略」末尾的「傳」，逐漸上升到稱「經」的地位。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刻十二經文字立於長安太學前，已包含《詩》、《書》、《易》、三《禮》、三《傳》，以及《論語》、《孝經》、《爾雅》共十二經，這是《論語》有確信根據的稱經記載之始。進入宋代，更是《論語》學發展的另一個高潮期，宋初同樣由官方領銜的經典重新整理工作，為《論語》重新作疏，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環，所以才會有邢昺領銜整理的《論語正義》之問世，至若到理學時代，《論語》與《學》、《庸》、《孟》同被歸入四書，經過理學家們的努力倡導與詮釋，四書在宋代開始逐步取代五經成為儒學最重要的經典典範，並影響其後八百年的學術思想走向。可以說從魏晉到唐宋，對於《論語》學以及中國整體經典詮釋史來說，都絕對是一段重要的發展轉變期。

三、皇侃《論語義疏》與邢昺《論語正義》

在歷代注疏《論語》的經注中，以魏初何晏領銜的《論語集解》、南朝梁代皇侃的《論語集解義疏》，以及宋代邢昺領銜的《論語注疏解經》、朱熹《論語集注》，與清代劉寶楠的《論語正義》最為重要。其中皇侃、邢昺與劉寶楠都是以何晏《論語集解》為底本，加以疏解的注疏體。這種注疏體例，是中國經典詮釋史發展過程中衍生出的一個特殊形式。而南朝梁代的皇侃《論語集解義疏》，與宋初邢昺在官方安排下領銜的《論語注疏解經》（又稱為《論語正義》〔註4〕），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又分別扮演了各自特殊的角色。

〔註3〕劉氏此書收錄在《魏晉思想》（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1月）甲編五種中，頁22～24。

〔註4〕關於此書的題名，在《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通志》等目錄中，均著

這兩部作品，不但在中國經學發展史中具有重要意義，提供我們由「義疏」體轉向「正義」體的重要觀察資料，在《論語》學史上，也是兩部分別具有不同承先啓後意義的重要作品。前者是六朝至今唯一存而完帙的《義疏》之作〔註5〕，《四庫總目》稱其「存漢、晉經學之一線」〔註6〕；後者是宋代理學思想發展成熟前的重要中繼與前趨，《四庫總目》稱「漢學、宋學茲其轉關」。不論在《論語》詮釋史上，或是在經學與學術發展史中，兩部注疏都是具有重要代表意義的，同時他們在彼此之間又有著緊密的承繼關係。《四庫總目提要》在評論邢昺《論語正義》時曰：

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而成。今觀其書，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傳以義理，漢學、宋學茲其轉關。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說出而是疏又微。故《中興書目》曰：「其書於章句訓詁名物之際詳矣」，蓋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後講學諸儒得沿溯以窺其奧。祭先河而後海，亦何可以後來居上，遂盡廢其功乎？〔註7〕

但是，邢《疏》在「翦皇氏之枝蔓」時，究竟是翦去哪些部分？而其所稍傳之義理，又具備了怎麼樣的意涵？這是使筆者感興趣的。

特別是由魏晉玄學到宋代理學轉變的這段期間，在思想內涵的發展上，本身是既有所轉化，但亦有其承繼。傳統以來，受到理學家標榜直承孔孟與排佛返儒議論影響，多將宋代新儒學發展之焦點放在宋學與先秦儒學、唐宋佛學、古文運動以降文化復古運動之發展承襲融會激盪過程為主軸，然而儒

錄為「《論語正義》十卷」，唯《直齋書錄解題》卻著錄為「《論語注疏解經》十卷」，不知為何異名？清代阮元所審定的《十三經注疏》中的《論語注疏》，在每卷開首亦題為《論語注疏解經》。

〔註5〕 唐以前義疏今多亡佚，今存而完帙者僅皇侃《論語義疏》而已。另有梁鄭灼《禮記子本疏義》、隋劉炫《孝經述議》、佚名《講周易疏論家義記》等殘卷存世。見張寶三：〈經典傳統中注與疏之關係〉，《「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政治大學文學院印行，2001年10月）頁315～338。

〔註6〕 皇侃《論語義疏》，宋以後中土亡佚，於清乾隆年間乃由日本傳回中國。參見陳金木：《皇侃之經學》（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第六章〈皇侃之論語學〉。

〔註7〕 清·永瑤、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卷三五·四書類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頁290。

佛道思想之交會激盪，本不自宋代始，而回溯孔聖以求取詮釋之正統性，更非宋儒之所獨創。事實上，回溯孔子思想本意，重建詮釋孔學，將己身、己代之論點與孔學繫聯，並標榜其與孔聖之承繼關係，乃為中國學術史上一再重現之模式。此一中國注疏傳統中特殊的「回歸原典」意識，讓我們在不同的時代思潮中，皆能看到打著孔子形象的新分身，這也使得《論語》一書的重新注解詮釋，在中國學術史中源源不絕。

馮友蘭先生曾將中國思想史劃分為經學時代與子學時代，其出發點即是注意到中國學術發展中，此一獨特的「回歸原典」模式，透過對已具正統權威之經典建行重新詮解以抒發自身及所處時代之新思潮，為中國學術發展中之一大特點。從這個觀點來看，研究由玄學思潮向理學思潮轉向下兩部重要的《論語》注疏，自當有其特殊意義，筆者所以選擇此二部《論語》注疏作為研究比較的目標，除著眼於其所匯集與代表當代思潮的獨特性外，更期望透過剖析其中對於孔聖的詮釋角度，對孔學中心概念：「道」、「命」、「性」、「聖人」……等內聖外王主軸議題的繫連、詮解、梳理出由玄學到理學的思想演變、連結與流衍。

第二節 本文之取材與作法

一、前代研究成果回顧

近代對於皇侃《論語義疏》與邢昺《論語正義》進行專門研究與評論的學術作品，本就不多，針對這兩部注疏作比較研究的，更是屈指可數。對於皇侃《論語義疏》的評論，主要集中在其雜染玄佛之語。至於邢昺《論語正義》，相關的研究則更為缺乏。

清·陳澧在他的《東塾讀書記》卷二〈論語〉言：「何注（論語）始有玄虛之語……自是以後，玄談競起。」其下條列皇侃《論語義疏》中所集孫綽、李充、繆協、郭象、江熙、顧歡、太史叔明等人帶有強烈玄學思想色彩的注文，並總結以：「此皆皇《疏》所採，而皇氏玄虛之語猶多。」下面陳澧並接著評議曰：「邢《疏》本於皇《疏》，而此等謬說，皆刪棄之，有廓清之功矣。」^{〔註8〕}陳澧的個看法，延續到民國以來的學界。一般的看法都認為，皇侃《論

〔註8〕陳澧：《東塾讀書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卷二〈論語〉，頁

語義疏》「失之玄妙」，至邢昺《論語正義》乃稍有廓清。

吳承仕《經典釋文序祿疏證》於「皇侃撰《義疏》行於世」條下即云：「自何氏《集解》以訖梁、陳之間，說《論語》者，義有多家，大抵承正始之遺風，標玄儒之遠致，辭旨華妙，不守故常，不獨漢師家法蕩無復存，亦與何氏所集者異趣矣。皇氏本通《三禮》，尤好玄言，故其為《論語疏》，頗採華辭以飾經說。」〔註9〕」這種以雜入玄佛思想角度去評價皇侃《論語義疏》的看法，從清末延續至民國，時至今日，仍是一般對皇侃《論語義疏》的主要認識，諸如戴君仁先生、董季棠先生、侯迺慧先生……等，皆主此說〔註10〕。近年來高荻華氏《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研究》則自皇侃闡發儒門本意的角度立論，頗有新意，然其僅專注於皇《疏》中對「先王之道」與立身之道的相關論述，對於《疏》文中其他眾多涉及天道玄理之篇章，未有著墨，似又有偏於一面之嫌〔註11〕。

至於對邢昺《論語正義》的評價，雖然主要也是立基在廓清皇氏玄佛之意與漢宋轉關這一點上，惜乎僅停留在個別文句語詞的鑑別上，缺乏全面與整體性的系統梳理，並且將前提過份專注在邢《疏》「廓清」之功上，也侷限了對皇《疏》到邢《疏》之間義理承繼與轉化的了解〔註12〕。

邢昺《論語正義》本於皇《疏》加以刪改而成，但究竟是刪改了哪些地方？卻是可以追問的。在刪改的過程中，是否流露出由魏晉到宋初儒學思想

17~18。

〔註9〕 吳承仕：〈經典釋文序祿疏證〉，《吳檢齋遺書》（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3月），頁146。

〔註10〕 戴君仁：〈皇侃論語義疏的內涵思想〉，《孔孟學報》第二十一期（1971年4月），頁15~30。董季棠：〈評論皇侃義疏之得失〉，《孔孟學報》第二十八期、二十九期（1974年9月、1974年10月），計43頁。牟鍾鑒：〈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經學〉，《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上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印行，1992年10月）。張恆壽：〈六朝儒經注疏中之佛學影響〉，《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上冊（同上）。孫述圻：〈論皇侃的論語義疏〉，《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上冊（同上），頁604~618。侯迺慧：〈皇侃論語義疏中玄學思想之評論〉，《孔孟月刊》25卷4期（1986年12月），頁18~28。濮傳真：〈南朝《論語》學之孔顏聖賢論〉，《北市師院語文學刊》1期（1994年5月），頁189~214。

〔註11〕 高荻華：《皇侃論語集解義疏研究》（臺北：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岑溢成指導，2000年）。

〔註12〕 如胡健財：〈論語邢昺正義述評〉，《孔孟月刊》第27卷第2期，總第314期（1988年10月），頁17；蔡娟穎〈論語邢昺疏研究〉，《國立臺灣師大國研所集刊》35期（1991年），頁19。

的轉變？究竟是哪些部分，會讓邢《疏》認為「援引不經」而必須有意識的去予以刪改〔註13〕？在刪改的過程中，邢《疏》是否也添加了新的東西進去？這其中是否流露出不同的經學思想意識？同時，作為「義疏」體的皇《疏》，與作為「正義」體的邢《疏》，兩者在體例上是否有所不同？他們在面對《集解》注文時的態度是否亦有所差異？影響他們去取的因素是什麼？又反映出怎麼樣的儒學思想差異的轉移？這些其實都是可以繼續探討的。然而，歷代對於這些問題，往往只是停留在外圍的考據或是單點逐句的批判，特別是有關邢《疏》對皇《疏》的去捨，只簡單的以刪除佛、道或怪異之說一語來加以帶過，似乎並不足夠。有鑑於此，筆者希望進行的，是對皇《疏》與邢《疏》進行全面性、系統性的比對與檢別，以求探究這兩部以同一注本為底本的注疏體，何以展現出如此不同的面貌。

二、本文研究取徑

然而，皇《疏》與邢《疏》間所可能存在的差異，若欲全部涵蓋，勢必非本文的內容所可容納，同時焦點也會過份分散，反而無法梳理出其中的思想轉移線索。是以筆者所希望採取的方式，是先選擇幾個關鍵性主題為綱目，透過這幾個綱目主題的討論，逐步梳理皇《疏》與邢《疏》在整體思想內涵上的轉變。

在研究方法方面，筆者將先以皇侃《論語義疏》與邢昺《論語正義》的注疏原文為第一手資料，透過對於相同章節疏文比對與相關主題的論述比較，嘗試探求從皇《疏》到邢《疏》的思想發展，特別關切的是邢《疏》在取舍過程中，所流露出之觀念轉移。同時既然皇侃《論語義疏》與邢昺《論語正義》的共同注疏底本都是何晏《論語集解》，他們對於《論語集解》的詮釋與注解是否有不同的表現與理解，當然也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以在討論皇《疏》與邢《疏》解經思想異同的之前，筆者對於何晏《論語集解》中所蘊含之義理亦會先作一簡單的梳理，之後在討論過程中，也會持續視需要援引《論語集解》與相關《論語》注疏本子作義理思想發展脈絡的對照與輔助。

除了《論語集解》之外，與皇侃與邢昺相近時代的思想家觀點，當然亦是本文探討皇《疏》與邢《疏》義理內涵時不可或缺的輔助，是以諸如六朝

〔註13〕《玉海》云：「唐《志》皇侃《論語義疏》十卷，邢昺謂其援引不經，詞意淺陋。」按今邢《疏》中未見此說，疑是昺進正義疏中語。

時期重要玄學思想家如王弼、郭象，以及與皇侃時代相近的張湛《列子注》、劉勰《文心雕龍》，與《弘明集》中所記載的相關文獻，都是本文在相關議題討論時的參考視角。至於由皇《疏》到邢《疏》之間的思想發展，筆者將以《五經正義》為主，在某些章節中，再輔以韓李《論語筆解》與朱熹《論語集注》作為對照。選擇《論語筆解》與《論語集注》，是因為在這兩部具有不同意義的《論語》注疏對照下，可以幫助我們對《論語》學詮釋史的發展有更貫串的掌握。

至於《五經正義》，則是因為筆者在比對皇《疏》與邢《疏》義理內涵的同時，發現邢《疏》援引《五經正義》的比例較意料中來得高，特別是在本文所涉及的幾個關鍵主題上，更可以看出邢《疏》如何受到《五經正義》的影響，這讓筆者不禁好奇，《五經正義》除了在注疏形式上影響邢《疏》，在義理內涵上對於邢《疏》所造成的影響究竟到達一種怎麼樣的程度呢？這其中所展現出的中國經學思想與經學傳統的延續性，又具有一種怎麼樣的意義？對於這個部分，本文在討論進行中，亦有相當涉及。

落實到皇《疏》與邢《疏》具體義理思想的討論比較方面，筆者的規劃是由人性論入手，在本文的第二章，先探討皇《疏》與邢《疏》解經思想中的人性觀點。透過對「性」、「情」……等概念的解析，做為我們探討皇《疏》與邢《疏》思想觀點的起點。

雖然在《論語》中對「性」、「情」範疇正面談論的論述並不多，但一則人性論是中國思想史中極為重要的一環，對於人性問題的思考，往往左右了中國思想家的整體哲學觀點，甚至影響了一代學者的思想走向。即使是罕言「命」與言「性」不可得聞的孔子，在《論語》中也已為我們留下了相當多人性主題的觀點。再者，《論語》中對性情概念未予詳論，恰巧也給了解經者一個更為開放的詮釋空間，在這種情況下，皇侃與邢昺如何詮釋《論語》的性命之說？在詮釋過程中又流露出一種對於人之存在怎麼樣的思考？自然成為一個有趣的問題。更何況在宋代理學思潮中，人性論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主題，理學思想家對於人性問題的創見，是理學得以為儒學重新建構一新天人體系的關鍵。然而理學並非前無所承，宋代人性論對於前代人性論承繼了哪些層面？建構了哪些層面？和佛道與玄學思想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將宋初邢昺的《論語正義》，與六朝皇侃的《論語義疏》中的人性觀點相比較，或許能提供給我們一些思潮演變的線索，筆者在這個章節中，對於這個層面，也會有相當程度的涉及。

在本文第三章，筆者將繼續探討的，是皇《疏》與邢《疏》解經思想中「道」與「理」意涵的比較。《論語》原文，「理」字並無一見，以「理」釋「道」，以「理」代「天」、代「命」，為宋儒（尤其是程朱一派）與孔孟儒學之一大差異與發展〔註14〕，亦是其為清儒所極力抨擊之處，然溯其源頭，魏晉之際已發其端倪，王弼注《易》、《老》、《論語》，郭象注《莊》，皆已表現出此一趨向，而由皇《疏》所處的六朝，到邢《疏》所處的宋代，更是此一思想趨勢發展的關鍵期。在皇《疏》與邢《疏》中，呈現出怎樣的一種「道」與「理」觀點，他們是如何來詮釋孔子之道的？「理」概念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由皇《疏》到邢《疏》，對「道」與「理」意涵的演變是否有義理脈絡可循？呈現出一種怎麼樣的天人關係思考？這是筆者在人性論觀點以後，希望接續探討的。

在本文的第四章，筆者將接續前章脈絡，討論皇《疏》與邢《疏》解經思想中聖人形象與聖人之教的意涵。孔子在漢代僅被視為「傳」，與被視為是「先王之書」的五經六藝之間是很有距離的〔註15〕。然而從漢末魏晉開始，《論語》的地位越來越上升，也越來越受到思想家與經學家們的重視，這和魏晉以降對於「聖人」與「聖人之教」的內涵開始重新詮釋的趨勢是很有關連的。所以筆者在最後這一章中，將嘗試探求皇《疏》與邢《疏》對此一層面所表露出之意涵，期望對於從魏晉到宋初之間的《論語》學詮釋史與經學思想發展，能有一個最後貫串性的串聯，也為本文的討論劃下一個階段性的句點。

三、凡例與版本

- 1、皇侃《論語義疏》的版本，筆者將以日本大正十二年（1923）武內義雄校刊，大阪懷德堂刊行的本子為底本。這個本子是 大正十一年（1922 年）大阪懷德堂孔子兩千四百年祭紀念會上，決議延請武內氏重新整

〔註14〕 錢穆先生曰：「孔孟所講主要在『道』，程朱所講主要在『理』……整個先秦乃至兩漢，亦都講『道』，莊子較多講到『理』，韓非、荀子亦偶爾提到『理』，漢代人或把『理』即注作『道』。但自魏晉南北朝下迄隋唐而至宋明，便轉而多講『理』。」〈程朱與孔孟〉，《中國學術思想論叢（五）》（臺北：蘭台出版社，2000年11月），頁284。

〔註15〕 邢昺在《論語注疏·序解》中曰：「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7年8月初版第十三刷，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本《十三經注疏》），頁3。

理過的本子，武內氏取日本所藏古鈔本十餘種，詳爲比勘後乃刊行此一版本。至於今天流傳在中國的幾個《論語義疏》本，是日本寬延三年（1705），由江戶學者根本遜志，據足利學校所藏寫本做過刻意更動後而成的。根本氏參照邢《疏》格式，作了多處臆改，又仿明代格局付梓，在版型上已失其舊觀。這個本子在乾隆年間傳入我國後，又經歷清廷修輯《四庫》時刪革改動的波折，更無法展現《論語義疏》的原貌〔註16〕。

可惜的是，懷德堂的這個本子，雖然在版本校刊上經過武內氏詳盡的整理，但本身在排版印行時卻留下相當多的文字錯誤。故筆者在引用時，將一方面以武內氏整理過的懷德堂本爲底本〔註17〕，一方面參考我國刊印在《知不足齋叢書》中的《論語集解義疏》本〔註18〕，以適時修改文字上可能的錯誤。

- 2、邢昺《論語正義》的版本，以臺灣藝文印書館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年）阮元審定之江西南昌府學開雕本影印之《十三經注疏》中的《論語注疏》爲定本〔註19〕。
- 3、現傳《論語集解》有兩個系統，一是皇《疏》系統，一是邢《疏》系統。皇《疏》和邢《疏》的《集解》底本各有所本，並不是在兩《疏》之間前後流傳中產生的差異，這一點可以從唐開成石經《論語》正文本，和日本所流傳的正平本《論語集解》單行本，也分屬不同系統得到證明。開成石經《論語》正文與邢《疏》底本《集解》正文基本相同，當屬同一系統，而與皇侃《義疏》底本《集解》正文則多有差異。正平本《集解》單行本則剛好相反，正文注文多同於皇《疏》底本《集解》，而與邢《疏》底本多異。〔註20〕

〔註16〕 見吳承仕：〈論語皇《疏》校本序〉，《制言半月刊》第三期（1935年10月），頁267～268。日·武內義雄：〈校論語義疏雜識〉，《先秦經籍考》中冊（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10月），頁69～98。

〔註17〕 據嚴靈峰主編《無求備齋論語集成》第五冊所收懷德堂本《論語義疏》。

〔註18〕 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臺北：廣文書局，1977年），影印清乾隆四十一年至五十九年（1776～1794）長塘鮑氏刊本《知不足齋叢書》第七函。

〔註19〕 《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7年8月初版第十三刷，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本），第八冊。

〔註20〕 見孫欽善：〈《論語》的成書流傳和整理〉，《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集刊（一）》（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頁19～21。除此二系統外，故宮所典藏